

做劉寶智軍師 為劉寶智獻策

右派分子王顯祖鬼計多端陰險毒辣

他披着馬列主義外衣，打着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
向黨猖狂進攻。並寫信責罵人民日報，為葛佩琦辯護。

整風以來，一貫披着馬列主義外衣的王顯祖比以前更為活躍了。他打着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以非常陰險毒辣的手段向黨進攻，在學生和教師中散佈反動言論，進行右派活動，特別是在整風期間積極幫助劉寶智向黨猖狂地進攻，在反擊右派的鬥爭中還幫助右派分子劉寶智進行退却，真不愧為右派分子劉寶智的一位軍師！

本來，劉、王兩人平日的來往並不親密，文人相輕的習氣在他們之間也很嚴重。可是，由於臭味相投，整風一開始便結成親密的“統一戰線”了。劉寶智的反動言論其中一部份是和王顯祖的點火有關的。他惡意地醜化黨委的領導同志，說什麼“王云是馬馬虎虎的官僚主義者”，“黨委委員們應放下老爺架子”；並捏造說他愛人調動工作時，群眾的小組鑑定被抽掉了，這些和劉寶智的口味正好相投，並增加了劉寶智對人事制度的不滿，要求公開檔案。他們還揣測我院領導同志之間有宗派活動，而這一毫無事實根據的揣測，便成為劉寶智在人事檢查組工作中的指導思想；說黨團員鳴放中有顧慮，還認為整風只是讓老年人“吐吐苦水”，又說我院某些黨員科長級幹部是50年才入黨的，沒有才德，只要入了黨便“吃喝不盡了”，並說55年肅反運動中李錫夫同志出席對×××的鬥爭會是為了報復。王顯祖在這些問題上千方百計地給劉寶智獻計。當劉寶智第一次發言後，足智多計的軍師王顯祖認為劉的發言太零亂，不能击中要害，便向劉獻策說：“應該抓住原則問題。”果然這位言聽計從的伙伴在他的第二次發言里談起“原則”問題了，這些所謂原則問題，大都是在個別的虛構事實的前提下，得出的荒謬結論。

反擊右派鬥爭開始時，這位機敏的軍師眼裡看來勢不佳，甚至感到“渾身不舒服”，於是關起門來，以小說作為消遣。但當劉寶智的問題被初步揭發後，這位閉門不出的軍師眼裡看自己親密的伙伴將被群眾識破恐怕牽連自己時，又不甘寂寞了。為了幫助劉寶智退却，他一方面

偽裝積極，打進群眾內部，向黨委摸底；另一方面和劉訂立攻守同盟。並說：“向黨委了解，如果不是右派，我們要保護你；如果是，就只好不客氣了。”在群眾的強烈要求下，劉不得不在大會上向群眾交待時，王又借著幫劉分析問題的幌子，幫助劉做假檢討，說什麼思想根源是個人英雄主義，舊眼光看新事物，受光明日報的影響等。當然，這樣的所謂檢討是騙不過群眾的。於是這位“鞠躬盡瘁的軍師”王顯祖又來對劉進行所謂幫助，暗示劉要把黨和黨員分開，錯誤只是由於對個別黨員的不滿所形成，而且要以更多的“理由”來說明對黨的“熱愛”。

當然，王顯祖的右派言行還不止這些，整風期間由組內到組外，由教師到學生中到處點火。在學生中散佈所謂“真才實學”的治校方針，和右派分子劉景芳的“內行人”治校相呼應，企圖取消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地位，而且說王云、王慕林等同志應下多種田；說什麼單憑三批材料不能充分說明胡風是反革命；而對儲安平、葛佩琦、劉景芳等右派言行表示同情，特別惡毒的是當批駁葛佩琦荒謬言論的文章出現後，王立即向人民日報寫信，為葛辯護，罵人民日報“沉不住氣”，更荒謬的是把黨和祖國分裂開來，說什麼不同意肅反運動並不等於對祖國三心二意。不僅如此，王顯祖還向人民日報寫信要求群眾參加黨內整風，主張鳴放小組各單位間取得橫的聯繫，這樣聲勢浩大，便於對黨委施加壓力。

當大家撕破王顯祖的馬列主義外衣，揭露和徹底批判王顯祖的右派言行後，他仍百般低賴，用盡各種狡猾手法，企圖蒙混過關，甚至想以不參加會議抗拒運動，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怒，群眾更加清楚地認清了右派分子王顯祖的本質及其面目，大家警告王顯祖應該徹底承認錯誤，痛改前非，洗心革面，才不自絕於人民。如果王顯祖仍頑抗狡辯，必須和他鬥爭到底。（一丁）

我的收穫和感想

——在七月二十日全院大會上的發言

張興鈞

我談一談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的收穫和一些感想。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就我認為比較大的收穫談一下。

第一個收穫是提高了我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認為對每一個人來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很嚴格的鍛鍊，鍛鍊我們如何正確地運用毛主席提出的六項標準，來區別鮮花和毒草；明辨什麼言行是屬於六項標準之內，什麼言行超出這些標準之外，是為人民所不允許的。

我們知道，國家政權是為階級服務的。為了鞏固政權和更好地為所服務的階級服務，那一個國家都有它的公民言行的標準。在這標準之內是有自由的，在這標準之外是不准亂說的。我們的國家如此，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我們的政權是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而資本主義國家是為一小撮資產階級服務的。六項標準是我國人民言行標準，只有人民對這六項標準有了明確的認識以後，才能更好地執行黨提出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文藝和科學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有些人嚮往所謂“絕對民主”，右派分子也以我國民主不夠，自由受到限制為口號，

煽惑一些對自由和民主了解模糊的人，以達到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他們之所以鼓吹這種觀念，正如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的，這些右派分子企圖利用這種觀念來喚散勞動人民的意志，瓦解勞動人民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這些人所嚮往的所謂“絕對民主”是不存在的。就以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來說，美國人自己常大言不慚地說，美國是所謂“自由世界”的堡壘。我只有在這兒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美國的所謂民主和自由。大家知道，美國的共產黨在法律上還算是合法的。他們之所以仍讓共產黨存在，美國官方承認是怕共產黨走入地下，走入地下後對他們控制共產黨的活動是不利的。美國政府要想宣佈共產黨為非法，隨時都可以做到的，因為議會是在資產階級手裡。議會隨時可以通過法律宣佈共產黨為非法。但是美國政府有另外一套辦法來限制和摧毀美國共產黨，那就是以陰謀推翻政府的罪名，強加在一些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頭上，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當然美國共產黨並未因此而鬆懈了他們的鬥爭。這就是美國對待反對他們的政權和政策的人的辦法，這就是美國的所謂自由民主。

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鞏固他們的政權，對學

生的政治教育也是很注意的。以我熟習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為例。麻省理工學院是培養理工方面人材的，但學校要求學生在四年內至少要修完六門他們所謂的“如何作人”的課才能畢業。這些課是美國史、勞工法、心理學、市場等。美國史，通過灌輸一些保衛他們所謂的傳統民主自由的概念，極力倡導大美國主義。勞工法、心理學和市場這些課的設置，以便培養他們的畢業生更殘酷地為大老板榨取工人階級的勞動果實。教師是不願學生思想出了他們所規定的圈子的。這裡有一個例子，有一個中國同學在考勞工法時，沒有按照教師的意圖答題，就不及格，補考仍不及格，教師認為這位同學不堪造就，其實這位同學專業課的成績是很好的。

資本主義國家尚且教育他們的學生維護他們腐朽沒落的政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新生向上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政權，當然更應注重我們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同學忽視政治和政治課的學習是沒有理由的。只有學好了政治，才能更好地掌握六項標準正確地運用憲法所賦予我們的自由權利。也只有學好了政治，才能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與陰謀破壞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右派分子展開鬥爭，以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

這次反右派鬥爭就是一課很嚴肅的政治思想教育課。這次運動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六項標準的含義，因此，大大提高了我明辨是非的能力。

第二個收穫是使我更加深了對毛主席

所說的教育者必須受教育的體會

這次運動不是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一個教師的言行會在同學中起多大的影響？我院的右派分子二劉一趙不就是利用了他們教師的地位在同學中起了點大火作用么？

由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若不好好改造自己，不僅對個人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還將會危害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擺在舊知識分子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路是不接受教育，不好好改造自己，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實際上在我國就是半殖民地的道路；另一條路是努力改造自己，跟着黨走社會主義道路。

最後我來談一點對這次運動的感想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偉大的運動。我是一九五五年夏天由美國回到祖國的。歷次的運動如思想改造和肅反運動等，我都沒有機會參加。關於過去運動的一些情況只能依靠美國報紙歪曲的報導。雖然有時也可看到國內的和香港出版的進步報紙，因自己沒有投入到運動裡，體會是極不深刻的。

我認為我們鋼院的這次反右派鬥爭是非常健康的，是沒有偏差的，而且不應該有副作用的。我們是應該對我們鋼院二劉一趙及其他右派分子進行批判的。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陰謀煽動學生上街，他們企圖把黨趕出學校，篡奪學校的領導權。假若黨不領導我們對這些右派分子進行批判，和他們劃清界限，是黨對全院師生員工不負責，是黨對社會主義事業不負責，同時對這些右派分子也是沒有好處的。

這次運動使我親身體驗到黨如何正確和靈活地運用了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領導我們順利展開這次反右派運動，並且勝利地引導這一運動告一段落。通過這次運動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黨是如何在群眾中作工作的，更進一步了解了歷次運動之所以取得勝利的道理，更增加了我對黨的熱愛。

反右派鬥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雖然我們反右派鬥爭現已勝利地告一段落，但在思想戰線上兩條道路的鬥爭還將繼續下去。我們的社會必須朝着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解放後八年來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取得空前的成就，社會主義前途是無限光明美好的。今後我一定要加強政治學習，努力改造自己，站穩立場，明辨是非，永遠跟着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邵以增的面目

姜志遠 王新玉 王金懷

为了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我們教务處、教务科、生产实习科、业教教工會小組的同志們，对邵以增的右派言論展开了批判。

邵以增对治校的主張

邵以增在六月一日的治校鳴放会上的发言中主張：学校应成立教職工代表大会，它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院長应该对大会負責。党只管理黨員，不应该和行政平衡。党通过代表大会领导学校，代表大会成員由民主选举产生，建立职工生活、劳动工資、人事會議、总务會議。参加成員，不按职位，而按本身所接触的工作。处科应取消，院長下面設組，一些干部应该調整，把全盤教师做一調整。有的教师不愿搞行政，但有的教师愿意搞行政，而且有經驗。

“用行政管理办学校，就是忽視高等学校的特点，领导思想，应该解决依靠誰的問題，应该主要依靠教学人員，权力应该下放。”

会后邵以增又說：“高等学校没什么方針政策，高教部有党组领导就行了。”

又說：“政治工作是簡單劳动，国民党时期政治工作人員工資是最低的，現在政治工作人員工資太高。”还說：“人事处应该取消，有一两个干部就够了。”还說：“学生已經經過入学审查，就不需要再审查了。人事科干部不称职，行政机构统统都是官僚机构。”等等。

从邵以增上述发言中，不难看出，邵以增虽然在治校會議上承認：“党应该领导学校”，但按其治校方案，实际上是取消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只限于管理黨員，在这一点上，和刘景芳相比较是異曲同工的。

对党和黨員的污蔑

邵以增說：“黨員开会或黨員和黨員說話，都是背地整人，說別人坏話，49年以前入党的因經過鍛煉，还可摆摆老資格，49年以后的黨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和我一样！”又說：“过去我到系里或教研組里，教师以为我是黨員，和我关系很不好。后来知道我不是黨員，关系就好了。”

在鳴放會議上，逼起云（黨員）講党内秘密問題，他說：“你別光在党内講，过去和我們在一起开会，怕暴露党内秘密，現在怕什么呢？有什么秘密可保呢？你看馬如璋和李救功多好啊！”还說：“我知道誰要說了坏話，

党就要算总賬。这次要报复，我也不怕。”

还有一次，他問教务長說：“学生这几天訪問你，是不是了解我們教务處有无右派言論？”同时又說：“我肯定教务處沒有右派言論。”

从上述事实，邵以增把党看成是“整別人的，說別人坏話的”，不受教师欢迎的；並借鳴放之机，企图逼問黨員暴露党的秘密，自己又做賊心虛，唯恐右派言論被暴露，而放風說：“教务處沒有右派言論”难道邵以增的言論和右派言論有什么区别嗎？

邵以增为二劉辯護

在前几次的爭鳴会上，邵以增屡次为右派分子刘景芳、刘宝智进行辯护，說刘景芳“客观效果上是起了点火作用，主观上不一定是恶意的。”說刘宝智：“看不出他是右派言論和右派分子，不能和刘景芳、章伯鈞相比。”还說：“客观上起到点火作用，主观上是善意的。”当同志們不同意他的看法，展开爭論后，他又耍花招地說：“我不知道我們在爭論什么？我的看法，和你們的看法一样啊！”又說：“可能是我的語文水平不够啊！”

狡辯不了

在同志們对其言論，进行揭发批判以后，他說：“我对刘宝智的发言只看了一篇”当別人揭发其不只看了一篇时，他又說：“我只看了兩篇，”后来又說：“第三篇我只看了标题。”对49年前后的黨員的污蔑，他狡辯說：“我是說个别的、局部的”，(事实上，他当时並沒有提到什么个别的、局部的。)对政治工作人員的污蔑，在会上他說：“我没說”。会后又說：“我是說东北的情况。”在治校問題上，一个同志、揭发其錯誤主張后，他說：“我没有說这句话。”后来一位同志念了当时的會議记录以后，他才承認：你的记录基本是对的，我的确是这样說的。最后邵以增感觉狡辯无效时，就說：“是因为立場不稳，对党还有距离，对右派分子恨不起来，几年来思想沒改造好。”

邵以增是善变的，一招不行另来一招。再不行，就弄个小帽子给自己戴上，企图蒙混过关。經過了多次的會議說理斗争，邵以增直至今現在仍沒有很好交待問題。

我們要問邵以增，你仅仅是立場不稳嗎？仅仅是对右派分子恨不起来嗎？为什么呢？我們認為：你的講話很多地方是和右派分子刘景芳、刘宝智是一致的。

我們經過学习，眼睛擦亮了。我們能識別什么是鮮花，什么是毒草。不会被你蒙混过去的。你如果不彻底認錯，彻底交代，我們要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时候；他大胆，那是在配合胡风向党进攻的时候，是在否定肃反成績的时候，是在嘲罵团委书记張柏生的时候，是在給“正义委员会”命名和起草宣言的时候。

在批判胡风的时候，他的“热情”沉默了；在反右派时，他的“热情”是反对“左偏激”。

由此可见，他有的不是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热情，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热情！

他还說：“我十分热爱社会主义的理論及其基本的现实生活实践，而对于違反社会主义的某些非基本生活实践我有极大的敏感。”可是，我不敢設想一个如他所說的青年，能够惡毒的嘲罵馬列主义，把它說成是教条主义，比作聖經；能把建設社会主义最积极最忠勇的战士——黨員——比作基督徒；能把热爱党、給予馬列主义理論崇高评价的人說成“不是愛它而是怕它”嗎？

一个对馬列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如立場，世界觀都厌棄、否定掉的人，怎能还热爱馬列主义？怎能是热爱社会主义理論及其生活实践的？要知道，沒有馬列主义，就沒有今天的社会主义！

他的“敏感”又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胡风分子和最近的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他的“敏感”怎么一点也沒有呢？只是在党整风时“敏感”到有可乘之机，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又“敏感”到势头不妙，赶紧退却，这也就是他的“敏感”的表现了。不过在我们看来，人民看来，这不叫“敏感”，只叫“兩面派手法”。

(四) 善变的“性格”和奇怪的尾巴

他还有一种战略性的先发制人的善变性格。他在1955年給党中央的信中，大肆攻击党的文艺方針和文艺领导者，替胡风辯护。这篇十分露骨和“理直气壯”的信寄出后，他馬上又做賊心虛地写了第二封信，自称上封信是片面的，是对“我所不清楚的文艺领导作了不知所然的批評”，說什么“几天来，我都很害怕。觉得做錯了事一样”。整风开始，他見机会到来，采用了較隱蔽的方式向党发起进攻，接二连三的“訴苦”，用拱云托月的手法否定肃反。在他6月12日給党委的信中，不仅否認了自己早已承認的、給党中央的信是有思想問題的，而且表明要跟党算倒賬！一到他的同伙王桂兴、孙果受到批判时，他又来个突变，赶紧給支部写信“認錯”，又“承認”給党中央的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質”了。

我們还可以看出他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留尾巴，总是說些：“我很忙，沒有仔細修改”，“我年青，帶着孩子气”，“我没有全面的写一写”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給自己留后步！一旦被批判时，可以有个退却的余地啊！

可是，他万沒想到，他那种随形勢而轉移的善变态度，他那拖下的尾巴，恰恰向人們揭示了他丑惡的真面目！

(五) 兩面派手法

也許有人要疑問：为什么他过去还是个“三好”积极分子呢？这正是他过去用兩面派的手法騙取了荣誉。他的兩面派手法是一貫的。举例如下：

①1954年他一面在“成長中的北京鋼院”小册子中发表文章，歌頌鋼院的新气象，另一方面又在写給朋友的信中說：“我能說什么呢？我知道人的灵魂的干涸是怎么一回事，現今在我們学校教育中，这缺点多么可怕地腐蝕着年青（輕）人……”

②1955年，他一面申請入党，一面抱着对党极大不滿向党中央投出了意見書，惡毒地咒罵党的文艺方針和文艺领导。

③整风期間，他一面說党实在偉大，一方面又否定和污辱肃反运动，說肃反运动是“人的尊严的压抑”和“理性被怪異所歪曲”。

④他一面表面上劝人不要“右偏激”；一面又竭力叫人不要“左偏激”，对反右派斗争大罵小帮忙。他在“无題”一文中就写道：“伤感的人說：天下大乱，一切都是黑暗的，連太阳也是涼飈飈的。乐天派說：一切都是无可非議的，連臭虫也是有益的。”

(六) 是个狂妄陰險的右派分子

一个从心坎里仇視社会主义的人，尽管他把自己标榜得如何热爱社会主义，但其真正的內在思想感情必然会指导他做出与虛偽标榜相反的行动，虛偽的面具掩盖不了反动的实质，早晚会揭穿自己！李慰飴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狂妄、陰險的十足的右派分子！

李慰飴是个什麼樣的青年？

机57.1 談嘉禎

正是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正是有些同学思想最混乱迷失方向的时候，作为共青团員的李慰飴，在机四鳴放大会上发表了动人的演說，在“北京鋼院”上发表了“我想……”一文。他的演說和文章的确叫不少不知究竟的“好心人”洒出同情淚，也博得“右記”人士的喝采声。当然，我决不想責難那些不知底細而同情他的人，因为他的演說和文章給人們散佈了这样一种毒素：肃反太糟了。就連象李慰飴这样仅有“微小”錯誤“正直有为”的青年也被斗了。正加“含苞欲放的香花被人折断似的，又好象为地园說而死的哥白尼一样……”

李慰飴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仙花，还是毒草？請看下面分解。

(一) 李慰飴簡歷

1955年1月底，住在有政治問題的叔祖家家里，在那里写了並寄出給党中央的信，起了配合胡风向党进攻的作用。

肃反期間，由于有严重的胡风分子嫌疑，被群众斗争过。

整风以来，任“机四正义委员会”的委員，“六月社”的社主兼“六月”刊的总編輯，阴谋推翻团机57.2支委会的參預者。

(二) 是“中国的哥白尼”嗎？

他不只一次吹嘘自己发现了一些文艺上和青年工作上重要的問題。在1957年6月12日他給党委的信中說道：“在兩年半以前我能

发现这些問題，已經是不容易的了。”是他发现了这些問題，並因此而被斗嗎？他是象哥白尼那样为維護真理而“死”嗎？我們要翻开几年前的胡风文章就可发现他的“发现”究竟是个什麼，那些只是抄襲和宣揚了胡风的反动主張而已！說現在文艺方面是“政治庸俗化”，观念公式化，方法簡單化”……等等。总之，反对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針，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在創作上“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的原则。

他所“发现”的青年工作問題，实际上也早为我们所发现並努力在糾正的，並非普遍的問題。而李却别有用心地加以扩大，用之反对党的青年工作的领导，为自己要求的资产階級“个性解放”找借口。

他所維護的就是他的这些“发现”，也就是胡风的主張。他自己在給党中央的信中就斬釘截鐵地說过，“他們（指胡风集团——作者註）所反对的正是我所反对的。”这位“中国的哥白尼”“发现”的和維護的“真理”是什麼还不清楚嗎？

(三) 他有什麼樣的熱情，大胆和敏感？

他在給党委的信中說：“我一直是热情、开朗、富于大胆首創愿望的青年。”看，多漂亮！不过尚缺一件：他没有闡明他的热情，大胆……等等是基于什麼階級情感。还是讓事实來說吧！他热情，那是在替胡风辯护的时候，是在搞“正义委员会”的时候，是在办“六月社”的时候，是在阴谋推翻团支委会的

右派分子孫明久煽動我們的實質

相二參加訪問同學討論 孫靜遠整理

對保密的看法

6月4日，我們相二有十一位同學去訪問孫明久。孫明久首先表示不知從何談起，因為要談，必然會牽涉“秘密”，不知那些可談或不可談。他認為保密範圍太大，這樣不但無好處，反有壞處。有些事保密都保出笑話來了。例如：外國人已發表的東西，我們却還在保密。

他說在鳴放中要真實地談一件事，必須舉例，因而不得不牽涉保密問題。例如談俄文教研組的事，他須牽涉某些先生的事。這些事說出來對先生不利，不說又無說服力。他又說：“我以前也是青年團員，但是我就不知道什麼是團內秘密？”當時他問一位黨員：“你說黨內有什麼可以保密？”他表示團員知道的比群眾多，黨員知道的比團員多。歷次運動中黨團員都帶頭，但這次整風他們却不積極了。孫明久又說：“現在的青年人教條主義和盲目從事很嚴重，因為很多東西保密，他們都不知道，只能聽人說，不能發揮獨立思考的能力。你們都知道胡適是一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但是你們誰看過胡適的文章？”談到“我的憂慮與呼嘯”一文時，我們認為是斷章取義、造謠污蔑，但孫表示我們知道的太少，那些事是有一定根據的。他又問我們知不知道蘇聯及其他國家對我國整風的看法。

孫明久認為現在很多東西不給看是很不對的，如“參考消息”。難道一個大學生連這種分析能力都沒有嗎？他說：“現在有賣短波收音機的，我就不相信買的人不聽外國和台灣的廣播，我就聽！”

對鳴放的看法

孫明久認為先生經歷的事情多，受的挫折多，他們不象我們青年人這樣單純，他們是有顧慮的。剛開始整風時，大家都很興奮，認為這個措施非常好。但是運動開始後，內部外部變相的阻力就出來了。大家要求邊整邊改，但是象于樹德的事情，黨委到現在還包庇。他又說：“人終究是人，雖說不打擊報復，但是檔案掌握在黨手里，前途就掌握在他們手中。領導要抓人小腳很容易，又沒有明文規定不許報復，這那能沒有顧慮。黨外的阻力是許多拍馬的人，這種人在先生、同學中都有；他們的進步不是真正的，只跟著黨員轉，對群眾盛氣凌人。在俄文教研組人們給黨員提意見時，他們說：‘黨員也有優點，不要否定一切。’這又不是開鑑定會，要談得這樣全面干什么？”

有人反對用“禍國殃民”等謾罵詞句，但孫明久認為為什麼要在別人的詞句上找毛病？別人過去受那么多氣，對鳴放已很有顧慮，是不是以後整的更厲害？在氣憤的心情下，詞句上有些過火，這樣找人毛病，別人勢必不敢再說了，這些提意見的人都是教條主義，是整風阻力的製造者。

孫明久談到，三害不徹底根除是危險的，俄文教研組有九個教師要走。劉景芳之所以敢說：因為他說完就走了；但別人還須考慮以後的問題。有些在鋼院中有“威信”的人是不願走的。靠近黨快要入黨的人也不敢提意見。學校黨委對教職工已放棄領導。黨委不實現自己的諾言，象科長到高級食堂吃飯的問題還不解決；王慕林還不退出整風委員會，黨委沒有表白自己的決心。這樣人們便不願意再提意見了。

對肅反的看法

孫明久認為“肅反違犯了法制，是疲勞轟炸。”他說：“被鬥的人說話，則是狡辯，不說又是死狗。杜院長在同學面前還說：‘自殺是反革命，因為你殺了人民，殺人民就是反革命。’我不同意這種說法，這是公開目無法制的具体表現；在青年人中竟散佈這種言論，我就不知道逼人自殺的是不是反革命。”“肅反運動養成青年人粗暴的工作方法，不動腦筋，亂扣帽子。”

當時我們就覺得：肅反中的錯誤的確很嚴重，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死了還是反革命。這種工作的是粗暴的，給工作造成了莫大的損失。

對黨的看法

孫明久不同意斯大林關於“我們共產黨人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的說法。他認為人都是碳水化合物。既然是特殊材料，當然一切都特

殊，這種提法本身就造成黨員的特權思想，黨要求群眾什麼都對黨談，但黨員什麼都是秘密，不與群眾談，這是不等价交換，使群眾不滿。有問題當面不談，過後匯報上去，完了在會上批判你一頓。久而久之，下回誰也不高興再談。許多事情不讓群眾知道，使群眾沒有主人翁感。接着，孫問我們：“到底現在的天下是黨員的還是人民的？黨是個工具。一切光榮應該屬於人民還是黨？過去把黨的作用過分強調，降低了人民的作用，助長黨員的特權思想。”

他又認為現在學校有六種人：黨內、團內、群眾的先進和落後者，他們享受六種不同的政治待遇。如果詳細分還可分出許多種。

關於其他

孫明久認為過去常要違背自己的意志說話。例如他認為俄文教學大綱所要達到的目的，根本不可能。但教學大綱就是法律，辦不成也得這麼說。他覺得自己欺騙了同學，今後不願意再看到下一代人也過這種欺騙的生活，所以告訴了同學。

當時我們只覺得孫明久很誠懇，教學大綱不切合實際，為何不讓修改反而逼得先生要背着自己的意志說話，甚至有些同學對學俄文也懷疑起來了。

孫明久談到俄文教研組的情況，談起某位先生如何不學無術，不工作，享高薪，官僚主義等等；又說某黨員不是組長、主任，却事事受他指示。孫明久對自己的處境很不滿意，認為自己寫了10篇論文，工作四、五年，還是十級助教。人們不是要爭那十幾塊錢，而是要使自己的勞動得到應有的估價，要得到信任。錢是不成問題的：翻一本書就有一萬多元。

以上就是那次訪問時孫明久對我們談的主要內容。訪問結束後我們一致有這樣的感覺：俄文教研組真糟，那兒非常不團結，鳴不起來；尤其是某位先生和黨員，使我們非常反感，在許多問題上受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如肅反問題，對黨的看法等。但我們也認為孫明久小資產階級情緒很濃厚，又很愛吹噓自己。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後，社會上，學校里反右派的鬥爭開始了，使我們重新想起孫明久的話。我們認為他是宣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但是我們還認為這僅是思想上的問題，個人情緒濃厚，偏激。經過各方面揭發的材料，通過其他訪問，又參加了多次俄文教研組的批判會，我們才認清孫明久的真面目，他是別有圖意的。

我們的分析

(一) 為什麼孫明久要說肅反是違反法制的。

我們沒有參加過肅反運動，對肅反情況不了解。孫明久的談話更使我們相信肅反的錯誤是極嚴重的。孫明久說了肅反運動許多的不

孫明久為什麼是右派分子

兼論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及黨對右派分子的政策

后畏

俄文教研組孫明久被確定為右派分子，他自己覺得不服，有的同志也感到驚奇；對別的單位右派分子，可能也有同樣情況，因此我認為有必要論述我們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且根據孫明久的右派言行，來論證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並談一下我黨對一切右派分子的政策。

一、我們劃分右派分子的政治標準

我們確定誰是右派分子，不是把人們幫黨整風期間對我們的批評鋒芒是否尖銳，措詞是否激烈，作為標準；也不是單純抓住某人在平時講些對黨不滿的個別的話，作為標準。而最根本的標準，是從他的言行中，看他的政治傾向，看他的批評是站在什麼階級立場；起什麼樣的效果，就是說，我們劃分右派分子，是有政治標準的。

這個政治標準，具體來說，我認為就是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演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這六條政治標準簡單說來就是：(一) 國內各民族的大團結；(二) 社會主義道路；(三) 人民民主專政；(四) 民主集中制；(五) 共產黨的領導；(六) 國際主義的團結。毛主席還特別強調指

是，最後還認為肅反運動養成了青年粗暴的工作方法，特權思想，高人一等，“群眾對他們都是憤憤不平”。我們要問孫明久指的群眾是誰？你站在什麼立場上說話？廣大勞動人民絕不會抱有象你這種看法。人民對肅反運動偉大的勝利是舉雙手擁護的。你顯然是以誇大事實，突出缺點來挑起更多對肅反的不滿，來達到你污蔑、否定肅反運動的目的。

(二) 為什麼孫明久要說現在什麼都是秘密。

孫明久認為“保密使人們變成教條主義，盲目從事”，他挑起我們去看胡適的文章，去聽“美國之音”；要我們要求去看“參考消息”，叫我們去“獨立思考”。他認為檔案掌握在黨手里，他們要“打擊報復”，（他想公開檔案）。孫明久這樣講的目的很明顯：煽動起大家對黨的不滿。想利用青年的嘴來為他說話，來反對對青年正確的教導。

(三) 為什麼孫明久要罵提正面意見的人。

孫明久把給黨員作“解釋”的人說成拍馬，把對謾罵不滿的人說成是教條主義。有人認為自己與黨沒有隔閡，自己自願有權，孫明久却說：“這是不說良心話，所有這些人是鳴放‘阻力’的製造者。”孫明久說這話的目的是企圖以此來煽動積極分子和黨的關係，封住別人的嘴，孤立黨；只許他大放謾罵黨、向黨進攻，不許別人正確的批評。他又想借此來挑起我們對某些老師的不滿和反感，破壞師生團結。

(四) 為什麼孫明久要問天下是黨員的還是人民的？

孫明久說過：“天下到底是黨員的還是人民的？光榮屬於黨還是人民？”大家都知道，黨和人民是血內相連，絕不能分割的。黨代表了人民最高的利益。孫明久却把黨和人民這樣人為的分開來，這又是站在什麼立場上呢？孫明久所說的“人民”，我們認為絕不會是廣大勞動人民。而是他企圖挑撥黨與人民的關係，使黨與人民對立起來。

我們的態度和希望

我們這些青年人，成長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熱愛共產黨。黨因教育我們，使我們認清了這些右派言論嚴重地損害着祖國社會主義事業。我們絕不允許這種言論存在，應把它徹底的加以批判。我們要堅決與違背社會主義利益的思想劃清界限。

最後想說明一點：我們參加了俄文教研組幾次批判會，會上我們失望地看到孫明久怎樣不老實的交待問題的態度；沒有表示出絲毫認錯錯誤承認錯誤的願望，只是不斷抵賴。我們很不滿意和憤慨。過去孫明久在我們中間有一定威信，我們都很信任他；但是在反右派的鬥爭中孫明久的真形畢露，是如此的丑惡，信任與他的威信已在我們同學間大大降低了，甚至威信掃地。但是我們仍然希望孫明久能好好考慮一下自己的問題，向人民請罪，徹底交代問題；我們誠懇地希望你離開反黨立場，回到人民的懷抱，不要選擇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出：“在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因此我認為凡是有意反對或破壞這六條政治標準，特別是反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的人們，就是右派分子；凡是堅決擁護和贊成這些政治標準的人們，就是左派；處於二者之間搖擺不定的人們就是中間的。

有些右派分子，不但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且有行動（有組織、有計劃、有策略）。當然也有右派分子，有言論，並無行動；也有右派分子，有行動，而無多的言論；這要具体分析。不一定二者具備才算右派分子，最主要的是看他的右派言論性質是否嚴重。是否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至於他們過去的历史問題，有助於我們聯繫、分析、充實證據，但也不是主要條件。

二、孫明久為什麼是右派分子

根據上述政治標準，我們來衡量、分析一下孫明久的言論和行動，就可以明確答復為什麼確定他是右派分子了。

(一) 孫明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下轉第四版)

物理教研組教師座談收穫

一致認為通過反右派鬥爭思想認識進一步提高了，今

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反對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

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物理教研組教師集會討論反右派鬥爭運動的收穫，一致認為通過這次運動，大家的思想和覺悟都進一步的提高了；澄清了過去對某些問題模糊的認識。

更加熱愛黨，應加強黨的領導

關於黨的領導問題：在每一個同志的發言中都談到中國革命由於共產黨的正确領導才取得偉大勝利，離開了黨的領導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從目前的反右派鬥爭的運動中來看，大家都認識到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不簡單，右派分子反對黨的領導，從政治、經濟、文教、科技各個方面向黨進攻，企圖取而代之。這說明階級鬥爭仍然存在，因此在一切工作中，必須百倍提高警惕，從各個方面來加強黨的領導，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順利地進行。

在討論中，教師們特別談到科學體制問題，右派分子對於黨領導下的科學工作極其惡毒的污蔑和誹謗的能事；他們對科學體制提的幾點意見就是反社會主義綱領的一部分。顧靜微先生提出了對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的看法。她說：“右派分子認為解放後科學事業中斷了。八年來我國科學家在科學研究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黨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以後，科學事業有了更迅速的發展。1952年高等學校由於適應國家建設需要，進行院系調整，忙於教學改革。在高等學校中不可能大力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可是他們不提這些客觀原因，以此混淆視聽。右派分子說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是不信任科學家，更是胡說。在黨領導下制定的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參加者絕大部分是科學院學部委員或國內知名科學家。可是右派分子提出保護科學家的口號，危言聳聽，企圖引起大家以為科學家受着威脅的錯覺，從中挑撥黨和科學家的關係。”最後顧靜微說：“科研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應該有重點的發展。但是右派分子提出要分散、自發的發展，使科研工作回到無政府狀

(上接第三版)

孫明久的言論，都是直接違反毛主席所提的六條政治標準的，而其中最集中的是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1. 歪曲黨的性質，挑撥黨群關係，反對黨的領導。

大家都知道我們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的政黨，其歷史任務是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我們黨的這個性質和任務，也就決定了我們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就如魚和水的關係一樣，是不可分離的。

但是孫明久故意歪曲和污蔑我們黨的性質。他一方面把我們黨、團組織看成同國民黨特務組織一樣專門搞人，監視人的。如他說什麼“團內人釘人”，“我們的檔案掌握在黨手里，也就是我們的命運掌握在黨手里；”另一方面，他把我們黨和人民群眾對立起來，說“今日的天，是人民的還是黨的？”這和儲安平的“黨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這裡，孫明久的企圖很明顯，不但自己歪曲黨的性質，反對黨的組織，而且還挑撥黨群關係，煽動群眾來反對黨。

由於孫明久的主導思想是反黨，因此在一系列的具體問題上，他都反對。他反對黨、團匯報制度，說什麼“黨在辦公室里聽單線匯報却產生了一種極壞的作用——這就是人和人之間沒有感情”，污蔑靠近黨的積極分子“為拍馬屁”；攻擊人事制度；反對檔案制度等等。

2. 否定肅反運動的政策和群眾路線，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

孫明久借我們肅反運動中方式、方法的個別缺點和錯誤，就認為我們肅反運動是違反法制的；認為肅反中的群眾運動方式粗暴，因此，他就站在敵對階級立場上，說“群眾”對我們憤憤不平，敬而遠之。很顯然，他是為反革命分子以及被鬥的人鳴不平的。他實質上是夸大缺點，企圖否定我們肅反運動的政策及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我們認為肅反運動是十分正確的和必要的，它是鞏固我們人民民主政權，保證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的一次重要運動。同時，由於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是一場艱苦的、複雜的

態；他們提出要恢復舊的社會科學，並把它擺在第一位，這也是荒謬的。因為這是開倒車，我們認為社會科學應該沿着馬列主義的方向發展。”

談民主和自由必須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前提

有關民主和自由問題，過去有人認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才叫做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經過這次運動和學習了有關文件，大家都認識到這樣的民主實質上就是小資產階級從自發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出發的民主，是追求個人主義利益的民主，它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必須以服從黨、人民的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利益為前提。又如過去有人常常嚮往的是不要集中領導的絕對民主，讀了周總理的報告以及在反右派鬥爭中大家都認識到了：在任何地方，任何國家都找不到這種絕對民主的，民主是有階級性的、有領導的。美國的民主自由也是只服從於壟斷資本家的利益，沒有抽象的民主、自由。我們國家的民主，正如周總理所說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我們的民主是為了團結一切力量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假若只有民主，沒有集中就不能達到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

這是一次很有教育意義的運動

對當前運動所採取形式的看法，教師們在討論中，都贊成這次反右派鬥爭採取群眾運動的形式，都認為這樣可以使右派分子在群眾中孤立，使他們今后的反動言行得不到市場和贊助者。同時由於他們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也教育了廣大群眾，進一步認識到資產階級思想殘餘的危害性。

為了進一步明辨是非，澄清思想，更有效的總結收穫，提高覺悟，物理教研組討論會還將繼續召開。(楊國平)

鬥爭，敵人是隱蔽的，因此我們搞肅反運動，不但依靠公安部門的工作，而且首先依靠廣大群眾的積極參加。我們認為，發動廣大群眾來參加肅反，不僅能夠比較容易發現暗藏的反革命，而且也是能夠避免主觀片面性，少犯錯誤。從我院肅反運動的具體結果來看：肅出了5個反革命分子；清查出了104人程度不同的政治歷史問題（其中有15~10人有着重大的政治歷史問題）；參加肅反運動的有3000多人，而坦白和檢舉的材料竟達4570多件。這些具體數字，不但充分地證明了我院肅反運動的成績是巨大的、主要的，而且也生動地說明了正是由於黨採取了正確的群眾路線，發動群眾的結果。通過肅反運動，又大大地提高了廣大群眾的覺悟，使反革命分子失去了活動的餘地，這也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潛在的收穫。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肅反運動中，在方式、方法上存在缺點和錯誤，但這與成績比較，只能說是次要的，決不能由此而否定我們肅反運動的政策及肅反中的群眾路線，孫明久否認這些主要的東西，實際上是在企圖削弱我們人民民主專政，有利於敵人進行反革命復辟。

3. 追求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

我們認為，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廣大勞動人民是真正享有民主自由的，而孫明久卻說：“在我們國家里，沒有真正民主自由。”很顯然，他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按個人意志處理一切，要求絕對的民主和自由，這是無政府主義。

我們認為民主和自由都是很具體的，有階級性的，而沒有抽象的、純粹的民主和自由。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對於人民實行民主，對於反動派和一切反抗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要實行專政。在人民內部，我們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自由是要受紀律的約束。孫明久追求民主自由的實質，是要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和破壞我們的民主集中制，並企圖煽動群眾對黨不滿。

4. 對目前時局的錯誤估計，反對社會現狀。

孫明久由於以上的錯誤思想，因而對我們目前的時局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對社會現狀

表示嚴重的不滿。他說：“多少年來為了一致對外，人民在忍受着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無情摧殘、壓抑！”很顯然，他在这里把人民描繪成處在非常悲慘的境地，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曾向別人講過這樣兩句十分露骨的完全站在敵對階級立場上的話：“何亞利事件是說明人民覺悟程度高，所以才搞大民主。”又說：“現在人民對現實不滿情緒很嚴重，萬一要有事，你看人民究竟站在那一邊。”正因這樣錯誤的估計目前時局，所以他說：“矛盾必須解決，必須正確的解決，必須及時解決；日益積累的不滿情緒，如果長期得不到平息，就會突然爆發，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波匈事件就是明鏡。”顯然，他把我國目前局勢估計為處在波匈事件前夕，這同右派分子會昭掄在章伯鈞召開的六教授座談會上估計我們目前時局是處在何亞利事件前夕，是完全一致的看法。這充分地表明了孫明久是不滿現狀，是反對我們新社會制度的。

5. 從歷史上來看，他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

從歷史上來看孫明久就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在1945年，孫在東北曾與他的同學組織過反動性質的“青年奮鬥社”，進行反蘇反共活動。他曾張貼過一張反動佈告，把蘇聯紅軍說成土匪，搶劫我們的東西，並說現在國內是兩黨之爭（指國共兩黨爭奪地盤）。在抗美援朝時，他曾與同學講“朝鮮戰爭糟極了，在北朝鮮特務有的是，並說：‘在北朝鮮有大量的美軍存在。’”孫明久究竟是站在什麼階級立場講話，這是顯而易見的。

從以上分析來看，孫明久的言論性質是非常嚴重的，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挑撥黨群關係，破壞人民團結，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破壞民主集中制，並在歷史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對於毛主席所提的六條政治標準，他實際上都是完全反對和破壞的。

(二) 孫明久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

孫明久不但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且有活動，有向黨進攻的一套手法。他的手法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1. 利用整風時機到處點火，煽動群眾，向黨進攻。如他召開俄文教研組老教師座談會（實際上就是點火會）；組織十名教師寫文章，反對一鳴同志的文章；煽動同學對黨不滿，向院長請願，並上書周總理，控告黨委等等。

2. 無中生有，造謠污蔑，企圖向黨進攻。如在整風開始時，他說整風有三個階段（1）大放、（2）爭鳴、（3）檢查，並說這是聽高院長報告講的，其實這完全是捏造。又說鋼院沒有斗出一個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等等。

3. 以打擊個別黨員（呂貴麟）和積極分子為名，實際上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而是反對整個黨。另一方面就是拉攏與他言論相投，行動一致的人，組織小集團，向黨進攻。

4. 玩弄兩面派的手法，蒙蔽群眾，口頭上說毛主席和共產黨真英明偉大，實際上反對黨，把黨罵得“一團糟”。

總起來說，孫明久不但有右派言論，而且有活動；因此根據劃分右派分子的政治標準，來看孫明久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我們完全有理由來得出結論：孫明久是個十足的右派分子。他同社會上的其他右派分子，只有大小不同，而無本質之別。

三、擺在一切右派分子面前的兩條道路

我們認為右派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右派分子，我們必須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予以打擊和孤立。否則，資產階級的中間分子就會被他拉過去，左派就會動搖。對右派分子，只有經過鬥爭，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右派分子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是不適用的。我們同右派分子的矛盾，是屬於什麼性質的矛盾呢？我認為既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又是屬於敵我矛盾。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這要看右派分子自己的態度是否轉變而決定。因此今天擺在一切右派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徹底交代，幡然悔悟，向人民請罪，向人民投降，這樣可以得到人民的寬懷，不予辦罪；另一條是拒不交代，抗拒改造，繼續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並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自取滅亡。兩條道路，何去何從在一定時間內主動權掌握在他們自己手里。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會主義改造的大門是向他們開着的，回頭是岸，為時未晚，否則，那就自絕於人民。